

129. 根据以明确语句表达的宪章第十八条第二项的意思, 把任何会员国除名是一个重要问题。它需要由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决定。我们已经证明, 不管对它诽谤的人如何诡辩, 中华民国毫无疑问地曾经是, 现在还是一个主权国家。

130. 作为一个妥协办法, 让我们投票赞成接纳北京, 反对把台湾除名。

131. 我们必须强烈反对任何把国民党中国除名的企图。弃权无异于缺席。

132. 假如在同阿尔巴尼亚决议草案[A/L.630和Add.1和2]的提案国初步接触之后, 除名条款是与这个草案的接纳部分连在一起的话, 我们不仅必须弃权, 还要把它当作一件有关本身利益的事项投票反对。

133. 不要让历史把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代表们记录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策划者; 如我所指出, 这个战争非随着中国自国际大家庭中被除名

的结果而发生不可, 这将是一场大家都是战败国而没有战胜国的战争。

134. 我们所想望的价值与和平不能通过对一千四百万男女妇孺的大屠杀, 而只能通过磋商出一个最后会导致整个中国人民的和平统一的共存制度来达到。

135. 主席先生, 请准许我以亚历山大·波普的劝世良言中指出的两个例子来结束这个发言:

“希望永远在人的胸怀中跳跃;

人是从来没有得到, 但是总应该得到福佑的。”

“荣誉与羞辱都不是因为某种条件而产生; 尽你的本分, 所有荣誉都自此而来。”

136. 让我们给予台湾人民以希望、信念和爱心。由于这个, 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你们是关心联合国的福利、团结一致与继续存在的。

下午一时散会。

第一九七一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星期三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 亚当·马利克先生(印度尼西亚)

议程项目 93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续)

1.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连续二十二年来联合国大会这个崇高的国际论坛一直在辩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问题, 这个权利为一个不代表任何人或任何东西的私人小集团所窃取。无论在这个崇高的讲坛或在安全理事会, 苏联代表们都曾坚持不懈地促请注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公然歧视, 并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

2. 远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 苏联就曾在安全理事会提出一个决议草案, 提议不承认蒋介石代表的全权证书并将那些代表从联合国中驱逐出去。^①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九日, 大会第五届会议一开始, 苏联代表团团长就建议应把蒋介石的代表们从他们所参加的联合国工作中驱逐出去, “因为他们没有权利代表中国, 这个国家的唯一合法的、公认的主权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② 并建议大会应通过一个“邀请人民政府的代表们参加大会及其各机构工作”的提案^③。

3. 其后, 我经常有机会在大会讲坛上就这个问

^① 文件 S/1443。全文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第五年, 第 1 号》, 第四五九次会议, 第 3 页。

^② 见《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届会议, 全体会议》, 第二七七次会议, 第 23 段。

^③ 同上, 第 88 段。

题发言，阐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贯的原则立场并为正义事业辩护，反对那些用机械的多数阻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人们。

4. 不幸得很，到今天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仍被剥夺参加联合国工作的机会。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人进行阻挠，在差不多二十五年之后的今天，他们对于这个问题还是念念不忘，没有得到任何教训。

5. 甚至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二十二年之后，当孤立中国的种种企图已彻底明显失败，当环境迫使这些国家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他们还不放弃在联合国保留蒋介石的代表、同时在不属于他们的台湾岛上保持他们的地盘的企图。他们坚持“两个中国”的陈旧观念，或坚持他们现在所提出的中国在联合国的“双重代表权”。他们硬说，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存在，因为台湾政权在蒋介石手里，所以应该承认实际的现状，应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政权——他们称之为“中华民国”——都在联合国获得席位。他们甚至企图用一种说法来威吓联合国的会员国，即如果把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则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将来都可能发觉自己也面临开除的局面。显而易见，这种比拟是愚昧的谎言，是给学龄前儿童胡乱编造的神话故事。他们甚至企图把驱逐蒋介石的代表一事说成是一个重要问题，需要三分之二多数才能作出决定，然而，任何具有常识的人一看便知，这基本上只是一个程序问题，只需一个简单的多数便可决定。人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个把本组织会员国从联合国开除出去的问题。我们正在讨论除掉一个窃据别人在联合国席位的私人小集团，并把这个被窃据的席位还给它的合法所有人。这个程序不涉及，也不可能涉及驱逐联合国任何会员国的问题。凡是反对这一点的人都完全是自欺欺人，不过明显的是，他欺骗别人更甚于欺骗自己。

6. 我确信每个人都知道，而且十分清楚，台湾不是一个国家。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和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不是台湾岛，而是中国。台湾岛从来没有被接纳为联合国的成员，甚至那位曾在这个讲坛上发言的联合国的老前辈都说不出它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的日期。他在发言中，曾对苏联的立场表示有兴趣。好吧，我就来提醒他一些事实。苏联为了争取公

平解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问题，曾经而且仍然坚决地、不懈地和毫不动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方。在这方面我现在要引用我自己讲过的话。一九五〇年八月一日在安全理事会第四八〇次会议上我以苏联代表身分曾作过如下的声明：

“实际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是一个遵守和尊重宪章的问题，苏联过去一贯而且现在也在为此问题进行争辩。苏联一贯遵循和平的政策并视联合国为和平的工具……

“大家都知道而且显然明白，中国的反对者、中国的敌人以及中国人民的敌人，他们处心积虑，不惜违反联合国宪章来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因此在联合国造成一种不正常的形势。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由于上述情况，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国成立的时候，所谓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占有席位，他倚仗美国统治集团的庇护非法窃据了中国的席位。……”^④

7. 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如今，甚至连那个象鸚鵡一般在这个讲坛上人云亦云的发言人也该理解和承认这一立场了；而重复别人的语言，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极尽恶毒诽谤、造谣诬蔑之能事已成为他的第二天性了。我们苏联代表认为，答复他的谩骂将有失我们的尊严。

8. 就实际存在的台湾岛而言，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台湾归还中国这一事实已载入最重要的国际文献中：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的开罗宣言和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的波茨坦宣言；而且这一事实为包括美利坚合众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所承认。只是由于外国强行干预中国内政，外国武装部队占领台湾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继续对蒋介石匪帮给予保护，才造成了联合国目前的形势，这种形势是大会讲坛上任何花言巧语无法证明是公平合理的。

^④ 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五年，第22号》，第四八〇次会议，第3页。

9. 在联合国不正当地玩弄“两个中国”和“中国双重代表权”的策略，是我们和一切始终忠于联合国崇高理想的人们过去一直，至今仍然坚决反对的，我们维护联合国的普遍性并支持联合国所确认的不容以武力夺取领土的原则。十分明显，上述策略旨在把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强行夺走，并对联合国的席位归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的中国人民一事继续制造种种障碍。关于此事我想重提一下苏联外交部长在本届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就此问题所作的声明：

“就苏联的立场而言，我们一贯反对对台湾的任何非法行动、反对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反对‘两个中国’的观念并反对任何‘中国双重代表权’的观念。这是我们的原则立场，而且我们要在本届大会坚持这一立场。”〔第一九四二次会议，第118段。〕

10. 不论我们与中国领导方面的关系如何——如所周知，这种关系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内有时有些紧张，但不是我们的过错——苏联依旧忠于列宁的崇高理想和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的原则。我们的立场一贯是，并且仍然是基于一个事实，即不理睬中国人民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在联合国获得代表权。

11. 时间和生活的现实终于显示和证明苏联和一些国家的政策过去和现在是何等高瞻远瞩，它们一贯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并要求在联合国结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歧视。的确，生活的现实已迫使反对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人向另外一种观点转化，虽然要他们完全改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然并不容易。他们试图以各种后卫行动来掩饰他们的被迫退却。但那是无济于事的，不会使他们赢得胜利者的荣冠。

12. 苏联代表团希望，常识和对当前现实的了解最后将获得胜利，伟大的中国人民在联合国受损害的权利终将获得恢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对本组织的工作作出贡献。

13. 埃斯皮诺萨先生(哥伦比亚)：哥伦比亚代表团希望重申其立场，并再次说明其政策。争执各方已在好多演说中说明了各个论据，因此在这次辩论中

没有什么新的或独特的见解可以补充了。不过，我们认为，重提一下我国发言人一贯提出的论点将是有益的；这一论点的提出，是出于想贡献一些力量解决问题，例如解决当前大会所注意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推理将建立在信守某些原则、信守一个法律概念、一个正义思想和一个平等观念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正是由于这些理由，我们的论点应受到尊重。

14. 我们没有那种使人恐惧的毫无益处或有威胁性的武器的支持，这是无关紧要的。本组织是在各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创设的——虽然有人常常忘记这一点——同时，因为它的建立是为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以我们这些没有战争潜力可使自己违背或无视联合国各项规则的国家，冒犯它的准则或违反它的精神的危险就比较少。因为我们这些中小国家的代表知道，我们只能靠法律保护，所以出于自卫和求生的本能，我们反而乐意保证严格遵守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建成一个共同事业以维护这个原则免受强国单独所能进行的任何可能威胁。

15. 由于这些理由和本组织坚持不懈的工作，我们认为，刚从战乱中出现的一名领袖询问要有多少师团支持教皇意见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仿佛那时的大屠杀已消灭了道德力量和精神准则，幸而全人类后来在一个也许是空前的团结行动中挽救了这些道德力量和精神准则。

16. 当然，我知道有些人或许多人煞费苦心，竭尽全力地阻止那个在旧金山宣布的“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的信念成为真正的现实。不久以前，几位杰出人士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把联合国的没有成效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三分之二的票数掌握在占不到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额十分之一的国家手中，借此暗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少数国家——富国、工业化和繁荣的国家——有智慧，而这些国家将在表决的偶然机会中消失，因为大多数国家态度暧昧，它们只是刚刚在发展而且不是一往直前地进步，因为其他国家所建立的制度和实施的方法扼杀了它们的种种机会。然而这个最新的分化企图不会胜过推动各民族和各国走向平等的钢铁意志。

17. 强国将逐渐开始认识到，它们也要对多次

失败、对抗和挫折负有责任——实际上是重大责任；或者，各项事件的压力将使它们相信，在维持一种既是革命的又是非革命的，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资本主义的现状方面，它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明智，它们缺乏时间观念，它们走过了头——超越了常理，这完全因为它们要保持特权和维护利益。最后，大家将一致承认，明确的思想并不完全靠积聚公共财富或个人财富，虽然，这种情况被那些力争摆脱发展落后的弊病的各个社会或国家证明了，不管那种证明多么零碎。

18. 因此，那时将没有傲慢或无礼现象，人们将本着和解的精神进行辩论，不使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共同寻求一种最有利于大家而不是只有利于少数人的办法，这办法是不再唯我独尊，不再排斥异己而是具有普遍观念。这种“没有限制的普遍性”是哥伦比亚最高当局所赞同的。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六日耶拉斯·雷斯特朗波总统在建议“作出使联合国毫无保留地对世界各国大开接纳之门的重大改革”作为实现宪章中所载目标的主要条件之后，他说：

“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建议，由各会员国决定是否接纳另一个国家，由它们确定该国是否‘爱好和平’，这就意味着把一个起严重干扰作用的政治因素引入这个国际法律机构。”

副主席莫利纳先生(哥斯达黎加)代行主席职务。

19. 我们现在在大会讨论这个问题，大家都十分了解这一严重干扰。然而，二十六年前的各项规定仍将继续列为优先考虑，尽管它们显然已嫌陈旧，尽管它们不止一次地在实践中遭到破坏或嘲弄或者象某种令人羞愧的情况那样，为了避免更为羞愧起见已不再为人所谈论。

20. 在宪章中被称为“敌国”的几个国家今天都成了联合国的会员国，就是说，它们成了进行合作以维持和平、促进安全、发展以及协调的朋友。本组织应避免成为一个闭门不纳外人的俱乐部，但是，与此相反，由于必须证明行为良好和爱好和平才能参加——正如加入某些社会机构，必须提出一定证明并取得某些提案国的支持那样——于是就有人求助于伪装，甚至无视宪章的文字；人们并不希望修改宪章，而是不时把它搁置一边，因为它起干扰作用并把事情弄得复杂化。

21. 旧金山会议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有人不承认情况已经根本有了改变，不承认现在应该给予获得国家地位的——让我们说，经过国际法院裁决的——每一个民族参加一个在那里需要大家合作以维持和平的组织的权利，他们宁愿坚持已被取代并具有时代错误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唯一价值是造成种种问题，例如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问题。通过正常的途径和传统的方法来解决所引起的种种问题是不可能的，这是必然的结果；因此必须求助于巧立名目、破坏法律并钻宪章的空子。

22. 在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上，便是这种情况。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和其他赞同它所提出的决议草案的代表团，多年来求助于“恢复”某些权利的权宜之计，以便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的案件提交大会而无须经过安全理事会，因为中华民国会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毫无疑问它会说，那个希望进联合国的国家既不“爱好和平”又不接受宪章所载各项义务。过分固守现状以及由于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一成不变而使已经不再适用的宪章规定继续有效，因此导致了对程序问题、甚至实质问题的曲解。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情况，它几乎象连锁反应那样能引起另一种或几种情况，因为在另一种情况下要经过安全理事会也是行不通的，这是由于存在着我业已分析过的不必要的政治因素的干扰。由于所谓“恢复权利”而驱逐中华民国，此事不容许如某些严格要求者所建议的那样以后再请求加入，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这条路也会因使用否决权而行不通。所以同样这个问题也必须由大会决定而不经安全理事会。

23. 由于我说过的理由和我将在适当时候提到的其他理由，我国代表团认为，一方反对程序的合法性的主张和对方的论点都无效。我已经说过，双方所采取的途径严格讲都不恰当。哥伦比亚并不认为只有本国独具真理，因此它同意遵循既定方针对此案件寻求公平合理的办法，世界舆论对此案件期待有所决定，大会现正对它进行工作。

24. 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在这个讲坛上说过一些话，我想回忆一下，因为这些话构成了哥伦比亚目前立场的背景。在表决以后解释我们

投票的理由时我曾确认了载于逐字记录中的如下文字：

〔发言人详细地宣读他的代表团在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对于投票理由的解释。全文见第一九一三次会议，第 79-81 段。〕

今天我高兴地看到，去年不同意哥伦比亚观点的几个代表团，甚至有影响力的代表团今天宣布并维护了与我们相似的意见。

25. 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未曾同意哥伦比亚的意见，当时前任外交部长洛佩斯·米切尔森先生认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重要的一个国家排斥在联合国之外而又要达成世界和平是不可能的，同时他又说必须尊重台湾人民的自决，不能把它从本组织中驱逐出去〔第一七六八次会议，第 34 段〕。但是后来许多国家在我们照旧宣布我们的意见时都说我们做得对。

26. 哥伦比亚现任外交部长巴斯克斯·卡里索萨博士同我一样是帕斯特拉纳总统领导下的哥伦比亚政府的发言人，他曾确认这同一观点，明确说明了哥伦比亚整个历史上国际政策所特有的一致性。他最近在一般性辩论期间所作的发言中曾说：

“驱逐台湾中国接纳北京中国既不是一个值得赞许也不是一个可取的解决办法，因为这样等于对一个已在本组织有合法席位的政府使用惩罚措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入联合国决不等于驱逐中华民国，我们绝不怀疑中华民国自由管理自己的能力和接受宪章所加给它的各项义务的能力。本组织容纳一个新的、伟大的国家将符合哥伦比亚所一贯提倡的普遍性，也顺应当代世界的一个不能否认的现实。”〔第一九五二次会议，第 174 和 176 段。〕

27. 这是一个现实，我来补充几句，它取代了关于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中国有两个政府这类问题的任何思想上的争论。这不只是一般的现实而是一个持续了二十二年的现实。现在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或统治福摩萨（即台湾）是不切实际的，恰如过去主张

中华民国代表整个中国一样不合现实。谁也不能忽视存在着两块不同的领土、两个不同的人民、两个不同的政府这一事实。在联合国这里，人们不能提出论点，说一块领土很大，另一块领土很小；说一个人口超过七亿，另一个只有一千五百万；因为本组织的许多会员国之间在比例上存在着同样的差异，而实质上则是所有会员国的主权都平等。

28. 事实是，国际法所规定的称一个实体为“国家”所应有的各种条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均已具备。非常可能，宪章并无明文规定或载入此种情形的法律方面，不过，这些都是显著事实，不容讳避。这些事实必须加以审议，否则一个伟大的法学家会把出现的情况称作“事实的变革与法规相抵触”；虽说法律冷酷无情，可是它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有效，因为它不可改变，而且具有创造力。

29. 哥伦比亚代表团坚持这些显著事实：存在着一个人口众多的伟大国家，居住在一个广阔的大陆上，同样也存在着另一个国家，虽没有那样大，但在法律面前应受尊敬，应享有平等，这个国家位于肥沃和繁荣的岛上，拥有千百万居民——比某些国家为能履行宪章所赋予的义务并被接纳为本组织会员所需要的人口还要多得多。

30. 另一方面，我要重复的是，我国代表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是应当的和必要的，这事已拖了很长时间，这比当年苏联被接纳参加国际联盟时拖得还久——这是值得注意的。我们赞同吴丹秘书长的中肯发言，他在今年本组织工作报告的导言中以合理的自豪感评述了由于本组织的行动所获得的成就，同时他也注意到，在联合国职权以外发生的种种冲突很少有机会立即终止流血，他的结论是：

“如果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已在本组织获得代表权，那么我相信就有机会更早和更有成果地进行谈判。”〔A/8401/Add.1，第 9 段。〕

马利克先生（印度尼西亚）回任主席。

31. 我国代表团认为，中华民国仍为联合国会员国也同样是应当和必要的，对此应予支持，其理由已由哥伦比亚代表在大会历届会议上说明了，我本人在去年解释我们投票态度时也提出过。

32. 有些代表团曾坚持认为,如不把台湾政府驱逐出联合国,北京政府就将拒绝参加。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对大陆中国作了几天访问后回来,在六月二十八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他在中国访问了周恩来总理,他在表示本人意见时强调指出,只要台湾问题不解决,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就不可能改善。但是恰恰在一个星期之后,即七月五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先生作了一个惊人的宣布,说他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将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访问北京。没有人——至少在此地——不知道他的顾问基辛格先生现在在北京和北京政府的官员们进行联系,为那个历史性的旅行作最后的准备。台湾问题的最后解决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于最后如何解决,我们此刻不作过早判断。

33. 在这届大会上,实际上已一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五强之一应在安全理事会占有席位,这是合乎逻辑的。这是一个不需要再讨论的问题;所有决议草案对此都提出了意见。中华民国只在大会保留席位。这是一个基本的分歧,是对事实的真实反映,而这些事实正是我国代表团意见的根据并将指导它在辩论终了时的投票。十分明显,如果现实情况不是如此,我们的行为也就不同了。

34. 我国代表团是决议草案 A/L.632 和 Add.1 和 2 的一个提案者,该决议草案规定“造成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任何建议……,依据宪章第十八条是一个重要问题”。

35. 既然我们没有照哥伦比亚的主张,采用一个决定各国代表权的法律的和机械的标准,那么我国代表团认为采取一切预防办法以防止对中华民国采用不公和惩罚的措施,实为必要,对中华民国采取这些措施并非出于遵守整个宪章——从序言中的各项标准以及用以指导解释所有其他部分的各项宗旨与原则开始——的意愿,而是出于一种报复思想和起干扰作用的政治考虑。

36. 过去,对这样一个提案总是就实质方面优先表决,以便我们预先知道在什么情形下通过或否决主要提案。那是正确应用宪章规则的唯一方法。反之就是对本组织的宪章准则的严重违反并将对本组织的

威信和它应有的声望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但由于这个组织,如人们几乎每天反复所说的,现在和将来都应成为会员国所希望的那样一种组织,我国代表团相信这个决定将令人满意,因为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会员国仍信仰联合国并认为这个组织是人类沿着和平之路走向各国人民辛勤寻求的更美好的生活的最后希望。

37. 我代表哥伦比亚代表团表示我的希望,即智慧常伴随共同努力而来,这是协力合作和共同渴望公平进步的结果,这种智慧在大会作出其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时将不会泯灭。

38. 莱尼亚尼先生(乌拉圭):我国代表团参加这次辩论,主要因为,我们是大会据有的文件 A/L.632 和 Add.1 和 2 以及文件 A/L.633 和 Add.1 和 2 所载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自然我要以最明白、最确切的语言尽可能简要地说明我们作提案国的理由。

39. 乌拉圭主要是一个和平国家,对法律抱有无可指责的信念,许多国际场合已证明它希望作出贡献,对各国所作的种种努力有所帮助,这些国家都是受崇高愿望所鼓舞,希望找到确保和平的解决办法。

40. 在目前情况下,我希望重新提出乌拉圭旨在达成这一崇高目标的对外政策上的两项行动。

41. 反复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战争是一种有蔓延性的现象并且不可避免地趋于扩大,记住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承认,如果要维持和平,就必需约束所有国家,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只有一个可以约束所有国家的国际行为的普遍措施才能防止好战冲突的扩大并保证和平的充分增强。

42. 乌拉圭代表,我国著名政治家唐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一九〇七年在海牙会议上所建议采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措施、一个普遍的措施,它要所有国家接受,甚至强迫它们接受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

43. 这个曾被叫做强迫仲裁的方式建议,当十个国家——它们中的一半至少得有二千五百万居民——各自同意把它们之间的争端提请仲裁时,这些国家便有权组成一个联盟来审查其他国家之间的争端并支持这个由受委托的仲裁法庭所决定的最公正的解决办法。

44. 这样一个倡议确是国际联盟盟约第十七条关于政府起源的唯一先例，它的宗旨是对国际冲突强行和平解决并在非联盟会员各国非法诉诸战争时予以制裁。

45. 事实上，这一观念，除了在对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制订或施加各项义务方面略有变动外，在宪章第二条第六项也有载述。

46. 我要提到的乌拉圭的另一项行动正好发生在旧金山草拟宪章的时候；那时，乌拉圭主张普遍性这个论点，因此各国加入联合国一事应该是全球性的、永久性的和义务性的。

47. 在草拟宪章的时候，有人提出驱逐一个屡次违反盟约原则的会员国的权力问题——此种权力最后载入宪章——乌拉圭代表团曾坚决加以反对，我国出席本届大会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派塞·雷耶斯先生曾主张，国际社会必须是普遍的、义务的和永久的，生活于国际社会之外是不可能的，国际社会是无法规避的，并且只要无损于这个组织的制裁体制，就不应发生退出或驱逐情事，因为这样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个国际组织的削弱与缺乏效能。

48. 乌拉圭代表团并不是不了解，联合国宪章的某些规定确实运用了普遍性这个准则。因此，我前边提到的宪章第二条第六项规定，本组织应使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范围内”照宪章原则行事。

49. 除了这个旨在限制非会员国行动的规则以外，宪章还承认非会员国的某些权利，例如：参加讨论身为争端当事国的各项争端的权利（第三十二条）；提请安全理事会或大会注意身为争端当事国的任何争端的权利（第三十五条）以及与安全理事会会商解决由于采取防止或执行办法所引起的特殊经济问题的权利（第五十条）。此外，各非会员国在本组织内行使联合国大家庭各机构职责的权利也已予扩大。

50. 我谈过的非会员国的义务和权利使我们有权认为，所有国家，严格说来，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不过有些属于积极会员国这一类，另一些则属于消极会员国这一类。

51. 虽然这件事看来非常明白而不需要提，可是

联合国获得更多积极会员国而非消极会员国从而增强它的普遍性，它的能量和效能便自然随其普遍性的增强而增强。

52. 我们现在这个大会所讨论的就是要 为达到联合国更大和更彻底的普遍性而迈出飞跃的一大步，要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并建议它应据有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席位。

53. 如果这个伟大的步骤涉及到驱逐中华民国，那将是不公正和不合理的。中华民国对一个特定领土和千百万居民行使统治权，是符合一个正常建立的政府所应有的一切要求的，联合国创设以来它在行为上没有违反过联合国的任何原则，而且它已被与它保持外交关系的其他各国所承认。驱逐中华民国显然违反包罗全人类的宗旨——一个自然会使这个世界机构生气蓬勃的宗旨。

54. 中华民国在福摩萨而且事实上统治着福摩萨，它不曾申请过联合国的会籍——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申请过——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但是联合国不能，也不该否定或无视两个政府的现实，从而不顾证明这些大家熟知的事实的证据；联合国更不能对接纳这两个政府漠不关心。

55. 确实，对于所提出的这个案件没有明文规定如何解决，对宪章条款进行随意的解释性研究也得不出明确无疑的答案。同样确实的是，各项准则、各种结构和各种法律范畴并没有，也不可能对它们所必须处理的各种现实情况提供适当的解决办法，而这些现实情况本身——或者由于对它们的不同处理方法——往往形成一种不断变化的现象。

56.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正在分析的形势就是其中之一——构成所有法律体系的共同基础的各项原则和法律规则、正义感以及宪章的各种准则内容，能导致取得想望的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

57. 当一个政府发生革命变革时，必须决定新的当局是否能够代表联合国内已发生这种变革的会员国，因为出现了不同的权力中心，它们之间有争端并互相争夺领导权。

58. 那就是原来提出的关于中国代表权的问题。

我说“原来”，是因为我们将看到现在的代表权问题，在我们看来，已经和过去的不一样了，即使解决这个问题的法定权力机构仍为这个大会；根据宪章第十条，大会有权讨论任何问题或事项，并就联合国所有其他机构的活动提出建议。

59. 我想再提一提，大会第五届会议曾对其他机构提出，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权是否适当应拿什么标准来确定。甚至今天还值得回顾一下当时为了使大会将来就此问题作出决定有所遵循所建议的两条准则。

60. 古巴在其他国家，其中有乌拉圭的支持下曾建议，为了确定一国是否具有适当代表权，应考虑下列各项条件：第一，对国家领土的有效统治权力；第二，人民的普遍赞成；第三，达成宪章宗旨、遵守宪章原则和完成国家的国际义务的能力和意愿；以及第四，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⑤

61. 联合王国所提议的另一条准则^⑥是新政府的有效统治，因为只有这样一个政府在内政上才能遵守宪章的义务并且一般说来能遵守国际义务。

62. 大会研究那些准则以后曾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

“……当一个以上的当局声称它有权在联合国代表一个会员国的政府而这个问题在联合国成为有争议的问题时，这个问题应按照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各个案件的情况来审议”〔第396(V)号决议，第1段〕。

63. 我们说，当前的中国问题已不是几年前的中国问题，那是因为时间不同了，而且，虽然这个问题的有关双方都声称它们应该有权代表中国，但已为事实所证实的这一真实的、大家熟知的和不可否认的情况不在于两个政府当局对同一领土和同一人民有争议并且争夺领导权，而在于两个权力中心对不同的领土和人民行使统治权力、有效地治理它们各自的领土并且都具备被承认为政府的各项条件。

64. 两个政府都声称有权代表中国，这一事实并

^⑤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61，文件 A/AC.38/L.6。

^⑥ 同上，文件 A/AC.38/L.21/Rev.1。

没有使大会不明了双方的政治现状或双方所具有的构成各自实体特点的一切要素。因此，大会在决定审议这一问题时要按照一般常识，根据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切合实际地加以解决，这一办法必须不折不扣地承认，两个政府都有效地存在，两者都代表中国，因而两者都应当被联合国接纳。

65. 把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席位分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让中华民国在大会占一席位，这难道是武断吗？如果我们认为，在安全理事会取得席位所应具备的现实要素同考虑承认其他常任理事国的存在所应具备的要素一样，那就没有什么武断可言了。

66. 在本大会，中华民国代表中国所采取的行动将符合适用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同样准则和同样条件。

67.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不能也不该作出驱逐中华民国的决定，因为这样做会违反基本道德原则；因为按照宪章关于驱逐会员国的第六条，不准许，也不会准许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就违反世界各地的基本权利的原则；因为这样做与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那些宗旨和原则直接规定的其他规定背道而驰；还因为这样做会使联合国声名狼藉，威信扫地。

68. 一些会员国多年来和中华民国分担共同的任务，处理共同关切的事情，它们的代表和中华民国的代表长期坐在一起并且以同等身分一起参加旨在促成亲密和友好关系的各种会议，如果突然召开会议并决定驱逐中华民国，把它撵出联合国——显然是指它的代表们——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说明这种突变的态度是合理的，那么从道德观点来看，确实是一件离奇的事。这样一种作法肯定会遭到严厉的评论，肯定会引起普遍骚动。

69. 是否可以不以道德理由而以所谓恢复合法权利、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和反帝斗争或其他类似理由推究出来的政治上或法律上的利益和理由来执行这种驱逐呢？那就越发糟糕了，因为历史在前进，没有一个国家不犯错误，而且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对它进行制裁——除非是一个绝对特殊的事例，不过目前这个事例并不是如此——这种制裁，不管你赞同不赞同，都超出了道德的规范而给人以莫须有的罪名。

70. 此外，出席本大会的所有代表团都知道普遍

性立法中所载的原则，即惩罚和严厉制裁只有对几种事例和情况才采用，而且明文规定不能依此类推，加以引伸，所以是用限制性的标准执行的；同时，这些情况从来不交给制裁者随意决定。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我们面临的这个事例从来不曾有过屡次违反宪章原则的行为，而按照宪章第六条规定把一个会员国除名的唯一情况是屡次违反宪章原则。

71. 如果由于需要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宪章决定争端双方应设法寻求一个解决办法，主要凭借谈判、调查、调解、协商、和解、仲裁、法律解决等办法；如果为了维持和平与安全，宪章规定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并消除对和平的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对和平的破坏，并以和平方法根据正义和国际法的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的争端和国际情势；进一步讲，如果依据宪章宗旨的昭示联合国充作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那么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不能就此情况作出合法决定进行任何驱逐。如果真的这样做，它便违背了宪章的文字和精神，而这种作法绝不是协调种种关系和防止对和平的威胁，而显然是想直接制造或鼓励国际对抗并在一定的时候形成对和平的新的威胁。

72. 此外，毫无疑问，人们所寻求的驱逐一事对联合国所造成的损害比所驱逐的会员国身受的损害更为严重。我们认为，联合国将因此失去声誉，因为这种作法缺乏崇高的感召并背弃它所创设的真实宗旨，特别是在已有了一个确实有助于协调行动和保卫和平的名为“双重代表权决议草案”〔A/L.633 和 Add.1 和 2〕的情况下。“双重代表权草案”只是服从现实和接受双重代表权，它所提议的办法会加强联合国，鼓励并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业已存在于在此有代表权的各会员国之间，虽然它们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却仍能彼此协调或团结，采取行动来保卫它们的共同利益。

73. 另一方面，当争论的两方人民——它们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是有组织的——都要求代表中国时，说来也怪，它们都是正确的，因为就社会、文化和历史来说两个都是中国，因而在联合国由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代表团所代表的都是中国。

74.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忠实解释联合国最崇高

目标的决议草案的通过，将是在消除或克服两方人民间，或更确切地说，同一人民的两个部分之间的种种困难的路途上迈出的第一步，借此联合国充任协调行动的中心来达成对保卫和平的基本谅解。

75. 另一方面，驱逐一个会员国将削弱本组织，将从国际社会排除一个国家并且构成一个不利于和平的行动，因为它将直接导致给本组织树立敌人。

76. 此外，决定采取驱逐会员国这样一项重要措施——这一措施因为它的重要性，需有大会三分之二的票数支持——而不是权衡它的全部影响从而采用中国双重代表权这一现实与和解的解决办法，将公然地和全面地与这种应该永远激励本组织的和平与和解的精神背道而驰。

77. 这种和解与现实的态度会增强我们组织的普遍性，并保证将来接纳新的会员国，从而增强它的普遍性，这种态度是由今天世界发展所处的情况决定的。

78. 我们大家所居住的这个星球体系显然已变小了，那是现代交通媒介和技术进步造成的。集体的需要正在决定多方面的深入和结合，而一个广泛的国际法结构支配着各国之间与日俱增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在今天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国家处于或被摒于国际社会之外，这个国际社会的最崇高和最有意义的表现形式就是联合国。

79. 诚然，在利益、思想、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会使某些国家和其他国家疏远隔绝。正因为存在这些差异，所有国家才应当在联合国——如果所有国家都完全相同，那就不需要有联合国了——致力于一项任务，即维护，为有效起见共同地维护，那些使它们不顾存在的差异而得以团结起来的共有或相互的价值和利益。

80. 所有国家都希望使它们的人民免于饥饿、疾病和住房的短缺，所有国家都希望防止战争、巩固和平、保障人类的生活以及人类的生存。

81. 基于这一切理由，必须确认，时代的标志显示出所有国家成为联合国的积极会员国是不可避免的需要，是绝对的需要，因为它们都是国际社会的成员，

因为联合国已为它自己规定了目标，这些目标只有在和平最高利益的卫护下通过普遍的有效国际合作才能达到。

82. 迪亚斯·卡萨努埃瓦先生(智利):智利代表团充分了解，它正在参加一场具有巨大影响的辩论，辩论的发展情况不但为出席大会的各国代表团所关切，也为全世界所关切。智利是怀着信心，同时也抱着一定疑虑来参加这次辩论的。我们说有信心，是因为我们已有了很大进展，使我们即将改正一个严重的历史错误；我们说抱有疑虑，是因为我们不是在进行一场真正的辩论，不是对情况作清楚的和客观的审查，而是发表一连串的声明，好象每个代表团都坚持己见，正在准备一场对抗，它们不是与所有其他代表团一起寻求最明智和最敏捷的办法来达到那无疑为本大会大多数会员国所希望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受限制和无条件地参加联合国。

83. 智利新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在上届大会上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那是依照我国人民的愿望，在基本原则问题基础上和对国际情势切实评价的基础上，对我国主权的自由的和自发的表示。我们不能继续无视一个拥有人类四分之一人口并且向着联合国规定的目标作出显著进展的国家。所幸的是，就中国而言，真理已压倒奥秘，中国正与其他国家不断地沟通来往。这是更和谐更有效的国际合作的一个吉兆。同时，这种情形可在世界范围内提高宪章的原则。

84. 这场辩论使联合国达到了它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对所提各项提案的最后表决结果将大大影响本组织的方针与工作。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正在作出贡献来终止多年来曾被用以反对一个伟大国家的敌对和歧视政策，这个伟大的国家拥有数千年悠久文化，是最伟大的人类之一，同时它已促成了本世纪最伟大的社会革命之一。二十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公开的或以各种借口进行的专横阻挠，使它不能取得它在大会、安全理事会以及联合国其他机构应有的席位。这就是冷战的可悲后果之一。现在世界的趋势是双边地并按照联合国持久的普遍精神使各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

85. 很明显，我国代表团并不只从中国进联合国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对这问题，我们有一种更广的看法，即涉及到缓和亚洲紧张局势的可能，有利于大国的谈判和合作，获得一种和平与信任的气氛从而使国际社会能致力于消除世界上如此众多国家人民的贫困这个迫切而艰巨的任务。要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加入联合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86. 我国代表团对这一事实表示满意，即很幸运，大多数国家已相信不可能再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本组织和整个国际社会。在理论上我们全都具有这个信念。问题是如何来付诸实施。我们认为，现在该结束这个具有恐惧、猜疑、孤立和硬把国家分成集团等特征的历史纪元，开始一个以广泛而有效的国际合作为基础的新纪元了，特别是现在联合国为响应我们文化和社会方面惊人的更新承担了巨大的任务。智利跟其他国家一样殷切期望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如果在显然默认中国恢复它的各项权利的同时，我们又看到奸计得逞从而推迟或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进入联合国，那将是最令人痛心和使人极端失望的。这种危险是存在的；在这个大会上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切望智慧和未来的先见将能获胜，以便使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

87. 我们不能一方面敞开本组织的大门让中国进来——保持其全部威力和尊严——另一方面又在中国刚要进来的时候玩弄欺人的借口和程序的诡计把大门关上，这种作法应解释为一种手法而不能说成是一种信念。多年来利用所谓“重要问题”的狡猾策略来反对中国——不是因为它事实上是一个重要问题，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手段，用来要求大会三分之二而不是要求一般的大多数。现在有人企图从新的角度抱着同样的意图，利用同样的程序来创造一种局面，使自己免于丢脸，但实质上等于堵截中国，不让它进入联合国。我们都知道，这种做法无损于中国，中国已等待很久了，它还能等待下去；这种做法将有害于联合国，因为联合国正在正常地进行着大会所属各委员会以及其他机构中的工作，在这些委员会和机构中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种等待状况，是一种真空和期望，就好象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我们可能通过的任何决定都不会有充分的价值和效果。

88. 二十五年来,中国在战胜饥饿和贫穷,战胜封建剥削和外国侵略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就。它不仅在满足其众多人口的各种需要上取得了成就,而且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也有所收获。这使它上升到核子和空间国家的行列。没有中国,在裁军或国际安全的道路上就不能有效地前进,国际发展战略就不能完全成功,联合国的效能和权威也就不能得到加强。假如中国加入我们行列——也就是说人类的另一个四分之一在联合国有代表权——我们的组织就将有种新的机会,它将通过保证它的普遍性并依据宪章所载的义务授予中国以责任而获得更大的活力。我们说的都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们只是重复在座的代表团所知道的必然的事情,显而易见的事情。然而,在本届大会上注定比其他各届大会更为突出的是,我们却有白白放过历史所赐给我们的机会的危险。

89. 虽然我们非常尊重决议草案 A/L.632 和 Add. 1 和 2 与决议草案 A/L.633 和 Add. 1 和 2 的草拟人,但我们认为他们的出发点是错的,与宪章的法律基础不符,或更糟的是,大大背离了这个基础!实质上,他们的目的在于达成联合国批准中国的双重性——一个具有两重性的中国;尽管有相反的争论,但从长远看,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种见解确是危险的,不但不能促进台湾省和平地、不用暴力地重新归并中国,不但不能促进民族的和解,反而会助长分裂并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一个永久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重新挑起业已终止的内战,甚至有在大国之间制造摩擦的危险。

90. 只有一个中国存在,一个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中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政权的代表都承认的。在联合国,只有一个中国席位。那个席位正遭到非法窃据。我们现在冒险又要非法地给一个集团设置一个特别席位,这个集团已为胜利的革命所取代,由于有人出于战略上的或经济上的原因,或出于政治上的同情而对他们进行特别保护,他们才能在台湾岛上避难并设法在那里安身下来。

91. 中国是联合国的一个创始会员国,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是五大强国之一,近几年来由于没有真正的中国参加,这个五强已减为四强,因为不代表中国的某人在安全理事会占据席位——他既

无身分,又无影响力,甚至不为所有其他常任理事国所承认。这一事实如此明显,所以文件 A/L.633 所载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1 段也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作为代表的权利并建议它取得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席位”。提出该决议草案文本的各国毫不犹豫地要把台湾政权的代表从安全理事会取消或除掉——我们不拟说“驱逐”——要把他们贬成大会角落里一个最不足道的角色。我们没有听到台湾政权的代表对排斥他们和反驳他们自称代表中国的声明的行动提出抗议。有人援用宪章第十八条,但并不把它用于安全理事会。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因为基础应该是同属一个。第十八条和其中有关三分之二的多数的规定仅适用于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情况,于是就有人利用一个武断的原则——一个会员国遭驱逐的假定。我们将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问题与接纳或驱逐会员一事无关:它只是一个全权证书的问题,就是说,接受更有权代表一个国家的人的全权证书的问题——不论这可能使那些相信自己有此权利的人感到多么痛苦。

92. 援用宪章第十八条——关于以三分之二票数驱逐会员的这一部分——是一个根本没有法律根据的虚构。在这个大会上谁也不曾要求驱逐一个会员,也就是说驱逐一个国家。谁也没有权在遭受国内绝大多数人拒绝接受的某个政权的基础上确立一个会员,也就是说确立一个国家。联合国是由各会员国组成的。宪章第三条和第四条明白确认一个会员即为一个国家。联合国是由不论可能发生什么意外事件而持续存在的国家所组成的,它不是由政府组成的,这些政府,由于人民的而非联合国的意愿是短暂和变更的。当援用宪章关于驱逐会员——也就是说驱逐国家——的第十八条时,我国代表团不明白指的是哪个国家。

93.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而且所谓中华民国的这个代表团也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它所代表的不是台湾而是整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各大盟国作出决议:台湾应归还中国。一九四三年的开罗宣言和一九四五年的波茨坦宣言对此都曾确认。本大会不能通过一项实质上是对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构成威胁的协议。这个协议还包含着更多意思:它会开创一个先例,即在一个内战中,假如有

一帮人设法暂时在有限的领土一角巩固他们自己并且享受联合国一部分人的热诚宽容，他们便能取得一个会员的特权，也就是一个国家的特权，因此就有了代表权，而换来的则是一个国家的肢解。

94. 为上述观点辩解就会导致虚假、矛盾和荒谬，因为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理当属于它的席位是本大会大多数会员国的真诚意愿，那么大会如背其道而行之，就会造成种种困难。假如大家的意愿结合起来并且把这件事归纳成本来面貌，一个代表权的问题，亦即将代表权从一个政府移交给另一个政府的问题，就象本组织各会员国之间常有的情况那样，那么一切就都简单了。一个全权证书的问题已变成当代最讨厌的政治问题之一了。

9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作的众所周知的声明来看，如果台湾政权在联合国保有席位，该国政府将拒绝派遣代表出席大会。事实上，它不能屈尊接受一个对中国说来等于放弃主权、放弃领土完整并向干预中国内政的人屈服的决议。台湾和它的政权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最诚挚地希望，中国应该重新统一，台湾和平地归还中国而且无外来干预。

96. 对智利代表团来讲，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和终止现在统治台湾的那个政权的代表团的职能，是一个整个程序上的不可分开的和同时并进的几个阶段。我们要重申，这不是接纳一个新会员国的问题，也不是驱逐另一个会员国的问题：这是一个承认真正的中国政府的合法权利的问题，其中自然而然地包含着不承认台湾政权的代表的意思。别无他途可循。任何人虚构的任何方案只会把明确和深刻的问题本质搞乱从而造成一个充满纠纷、磨擦和沮丧的时期，这将对联合国大有损害并且将妨碍为缓和国际社会紧张局势所作的种种努力。

97. 智利代表团毫不含糊地坚持一个鲜明的立场。我们将投票赞成决议草案 A/L.630 和 Add. 1 和 2，同时反对会导致双重代表权的任何提案、修正案或再修正案，也就是说，反对任何权术，其或暗或明的目的在于推迟完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以取得它在本组织的席位或使之成为不可能。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采取这个以智利人民和政府的坚定信

心为基础的立场，就是在为联合国的健全和声望作出贡献，这个组织将与日俱增地成为加强和平，保证人类进步新的途径的基本工具。

98. 姆博尼·达夫·德拉米尼先生(斯威士兰)：本大会不能自以为过去的情况并不存在，因为我们组织的存在就有力地证明过去的情况确实存在。我们的组织是二十六年前在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和平、正义和进步——本大会去年在一系列宣言中重新致力的一些理想。对于我们这些今天在此集会的人，当务之急是处理和纠正存在了二十多年的情况。对我们来说，过去的情况至今还存在，现在的情况则存在于未来。我们不要让二十年后在此集会的人说，这个可敬的组织未能遵照宪章原则协调各国的行动。

99. 当前大会面临的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国代表团不理解，为什么大会上有些代表团认为它不是一个重要问题。

100. 在支持和赞助文件 A/L.632 和 Add.1 和 2 以及文件 A/L.633 和 Add.1 和 2 中的不除名决议草案时，我国代表团要寻求的不是一种对抗的情绪而是对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不是斗争，而是合作；不是敌对，而是本着宪章精神的友谊。我国政府支持并同意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所谋求的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的席位而同时保留中华民国在这个组织的会员资格。这里有些代表团曾经争辩——也许相当吃力——说这些决议草案跟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观念不相容。

101. 二十年前，中国因内战而分裂。那次斗争之后，产生了两个政府，他们的要求互相冲突：一个政府统治着大陆中国，另一个政府统治着中国的某些部分，但主要是台湾岛。

102. 斯威士兰代表团认为，两个政府的存在是中国今天的现实情况，两个政府各自的主权都不为对方所承认，但是却无疑地为世界所承认，因为事实上两个政府各自统治下的人民都通过其公认的当局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每当提到重迭的领土要求时，总要引起国际法的争论，这个问题也许势必造成混乱。

103. 虽然今天中华民国在大陆中国的政治、军

事影响确实是有限的，但是中华民国继续以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实体存在，这仍然是个事实；它继续保持一个现代主权国家应有的一切特性；它拥有领土、人民、政治组织和有效的政府；它与外国有外交关系，还有联合国的会员资格，而这里的某些会员国却要我们剥夺它这个资格；它对一千四百万人民——不是二百万——行使有效的统治权；它代表中国人民的文化道德传统，就象任何有效政府一样。

104.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提出，本组织不能把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在实质上或含义上作为简单的全权证书问题处理，因为明显地存在着我国代表团称之为部分的或双重的国家继承问题——不是脱离问题；我重复一遍：不是脱离问题。

105. 在这个讲台上主张驱逐中国的代表团也不能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声称它如今在台湾行使统治权，如同中华民国不能声称它在大陆行使统治权一样。因此，存在着两个有效政府的情况是不容否认的；这两个政府——有效的政府——各自代表着一个伟大人民的部分利益的事实也同样不容否认。

106. 本大会也不能否定过去几年中国发生的剧烈变化。举例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要求在它进入联合国以前修改宪章。今天在这个问题上却又保持沉默了；这个国家愿意在不期望宪章有何修改的情况下进入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相互隔离多年来一直是这两国政府或人民之间的一堵墙。今天，这两个大国在共同打开这道隔离的墙。这是我们时代所发生的伟大变化，这些变化也说明有可能解决中国问题——也许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法律上的理想主义和政治上的思想意识不应当阻碍有关中国的人类形势的解决——我要强调我们关心的是中国的人类形势。

107. 我国政府所支持的“不除名决议草案”即决议草案 A/L.633 和 Add.1 和 2，是按照宪章的文字和精神想谋求保存宪章原则的实质并考虑中国自一九四五年以来所发生的变化。

108. 所谓“阿尔巴尼亚决议草案”[A/L.630 和 Add.1 和 2]，照我国代表团来看，只不过是剥夺中华民国享受多年的国际地位并把台湾当作一个纯属内

部的或内政的问题来处理。我们认为，如果情况真是这样，只要中华民国是宪章中特别指名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这就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免于承担中华民国的义务，而后者确实作为创始国之一继承了我们组织的这些义务、原则和宗旨。

109. 作为一个小国和会员国，斯威士兰对联合国内各国平等以及所有国家在大会正确表示的坚持各国对内政的主权感到高兴。然而，我国代表团认为，由于历史的因素许多领土包括几种不同的民族；我们还认为，如果不允许联合国各国人民在平等基础上，在不损害现存政治关系情况下参加，则联合国对各国人民自决所承担的义务将成为幻梦，无法实现。

110. 我国代表团听到一些论点，其根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因此它的意见应当在这些会堂受到注意。我国代表团同意这一点，并且对国际社会能有这种了解表示高兴。我国政府同意，共同提出的这个决议草案注意到这个重要的发展。我国政府还同意，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本组织的席位，作为政治原则问题，它应当取代中华民国在安全理事会的会员资格。我们认为这种取代是合理的。因为数字的规律应当指导我们，所以中华民国靠它对大陆的统治权而在一九四五年被授予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当时它对中国的那个部分拥有实际的、政治的和军事的统治权。此外，我国代表团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一个空间的核超级大国地位的标记。这就使它突出地具有在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方面必须发挥作用的资格。

111. 但是无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超级大国都不能垄断和平。热爱和平和维持和平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过去二十六年内，中华民国在和平问题和人道问题上所表现的道德品质和责任感在大会中一直是无懈可击的。

112. 普遍性是联合国的目标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目标。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当然使我们今天比过去更接近普遍性，但是我们不能为达到这个目标一会儿宣布普遍性，一会儿又背弃它。我们不能以驱逐我们中间一个拥有一千四百多万人民——让我再重复一遍，不是二百万——的可尊敬的会员国而达到普遍

性。如果把中华民国这样一个可尊敬的会员国从我们的组织中驱逐出去，联合国的法律和道德威信也要发生问题并且会垮台，因为这样一来，没有一个会员国可以确信自己的会员资格是不可侵犯的。

113. 现在总结一下。第一，因为过去二十五年来，本大会一再肯定中华民国政府具有连续不断的中国代表权，因此我国代表团在共同提出决议草案 A/L.632 和 Add.1 和 2 时，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当。我们强烈要求所有其他代表团投票赞成这个决议草案，因为如果和当这份多年的记录必须重作或重写时，按理应它就应当象当初一样地重写。如果联合国的一个创始会员国被驱逐出我们的组织，我不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不应当按宪章第十八条作为重要问题来处理。

114. 第二，我国代表团认为，中华民国不是一个流亡政府，也不是一个脱离主义的政府。它是一个事实上的政府，完全控制着台湾，并且二十五年来一直如此。这样说并不是要肯定它的脱离或制造中国人民之间的分裂；这只是根据现实。台湾岛上的中国人民和中國大陸上的中国人民追求不同的政治理想。我国代表团支持的决议草案要保证所有中国人民都能在我们组织里派有代表。

115. 第三，联合国是一个“人民”的组织。这是联合国宪章序言所说的。因此它必须反映这个因素。它必须反映我们所生活的实际世界。少数人民因为历史条件而处在其他主权国家的疆界之内，如果他们有确实行使权力的政府，那么他们的自决权不应当被否定。这就是我国代表团对普遍性原则的理解。人民不一定总是多数；人民也可能经常是少数。

116. 第四，我国代表团将投票反对所谓阿尔巴尼亚的决议草案，因为那个草案是不必要地苛刻，是不调和的，是惩罚性的，它要“立即驱逐”我们其中的一个好声望的会员国，而它的错误——也许是它唯一的错误——是它迄今一直热心于我们的组织。

117.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蒋介石的代表迄今非法占据二十二年之久的联合国席位本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在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人民力量取得胜利，封建和反动政权的头子蒋介石逃跑和新中国随之诞生之后，这

本来应当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在过去二十二年里，中国有了稳步而惊人的进展，而中国成为强国的意义也越来越显示出来了。

118. 但是由于美国一贯反对，人民中国的代表权一直不能实现。在我们这次辩论的后期，在大会上详细回顾美国在规避中国在联合国的正当代表权上所玩弄的各种花招是毫无意义的。这些都已载入记录，而且人人皆知。我们只要回顾下列情况就够了：在五十年代，根据联合国的法律和惯例，只要通过审议中国的新政府是否在该国领土范围内行使有效职权，代表权的问题就可获得解决；而在当时，主要由于美国的影响，这个问题被搁在大会议程之外。

119. 在六十年代，由于联合国会员国的增加，使得美国难以继续理所当然地控制多数，于是就发明了“重要问题”这个把戏以阻挡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这个预料到的潮流。这种花招一直相当吃得开，直到去年终于明显地看出美国的劝诱或威胁再也阻挡不住奔向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日益强大的潮流。

120. 因此，我们看到了美国目前的立场。它的发言人称之为“一种新途径”。十月十八日美国代表在大会上宣称：

“现在该是联合国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解决的方法必须对各个方面都是公正的，在反映事实方面必须切合实际，对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必须都是建设性的。”〔第一九六六次会议，第 78 段。〕

121. 我们欢迎美国的立场由完全反对转到目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的情况。毫无疑问，尼克松总统即将进行的访问有加速这种演变意义。那些人现在才“注意到生活在这个古老的文化摇篮里的伟大人民的勤劳、天才和成就”——我在此引用菲利普斯大使的一段话〔第一九〇二次会议，第 88 段〕——而早在他们最近转变之前，坦桑尼亚政府一直坚持恢复中国人民合法权利的立场。从独立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这个正确的立场。

122. 鉴于目前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接触以及尼克松总统计划到中国进行访问，世界有充分理由期待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将反映以下这个更现

实的态度，就是说该国政府似乎即将对人民中国的重要性和意义给予应有的承认。但是我们还是要失望的。因为看来美国在代表权问题上改变立场只是一种策略。而它的战略，尽管拙劣，却一成不变。它进一步在程序方面和其他方面玩弄各种花招，目的是使八亿中国人民不能在这个组织里获得代表权。

123. 美国代表在十月十八日星期一的发言中〔第一九六六次会议〕呼吁现实主义。可是他却千方百计地拼命破坏一个现实的解决办法。今天的现实是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美国搞的隔离和孤立政策已惨遭失败。越来越多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其他关系。确实，从大会上届会议之后，我们看到，在世界许多首都，蒋介石的代表被驱逐，虽然绝不是出乎意料，但也相当戏剧化。这个过程是无法挽回的，而且我相信美国代表团不会不了解这点。令人高兴的是，我们注意到就在这个大会，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如果这个组织要认真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问题，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有代表是无法规避的。一年以前〔第一九一三次会议〕这个新的现实主义在本组织多数会员国投票赞成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时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124. 现实主义说明，现在是时候了，决不能再让不管以什么伪装或什么形式出现的各种花招破坏本组织多数会员国要求中国合法代表到我们中间来的愿望。鼓吹“两个中国”政策并且滥用什么正义和现实的需要等漂亮词句以掩饰这种政策，就是继续剥夺中国人民在这个组织的席位。

125. 因此现实主义进一步要求，不得阻挠中国人民在本组织发表真实意见。我们非常细心地听取了布什大使在本星期一发言中要求公正行事的呼吁。但是公正行事要求的是，那个伟大国家的合法权利不应该再被剥夺。

126. 我们还听说，中国不应当按它自己的条件进联合国而应当按联合国的条件。话说得相当公正。这当然是合理的，我们完全赞成这种主张，但是我们先要搞清楚联合国的条件是什么。听了美国代表的讲话，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他要大会相信美国的条件是跟联合国的条件一致的。

127. 本组织的条件不能和宪章各项条款的原则和宗旨所包含的条件有所不同。我们宪章提到了中国，也承认了它的权利。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的宪章不能宽恕对会员国内政的干预。推行一个专横地干预属于一个会员国内政管辖范围的内部事务的政策，然后把它称为联合国的条件，这样做，说得再好也是篡改联合国宪章条款。

1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坚持它的原则，它曾明确表示如果本组织决心干预它的内政并且自称知道哪种做法对中国人民最有利，那么它就不会同本组织发生任何关系。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甚至蒋介石政权的代表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这点。事实上，我国代表团这次特意听了蒋介石代表在第一九六七次会议上的发言，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在发言中无时无刻不想给人一个代表中国的错误印象。

129. 没有一个具有自尊心的国家愿意让一个它必须奉行其宗旨的组织故意使它国家的分裂永远存在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例外。这并不是给本组织强加条件。这只是合理地重申该国的合法权益。最重要的是，它坚持认真遵守宪章的规定。

130. 美国代表声称他没有鼓吹“两个中国”的立场或“一中一台”的立场。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们不禁要坦率地问，布什先生究竟在鼓吹什么？如果我们要从他的讲话中推出一个合理的结论，那么可以看出，美国人拚命要在大会议保留的蒋介石代表团既不代表中国也不代表台湾。因此，我们被要求的是，允许一个代表私人小集团的代表团继续留在我们的组织内，而同时否定真正的中国的代表权。人们可以理解布什先生在这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抗拒的趋势下所处的困境。也许人们甚至还可以同情他为了充分利用这个非常困窘、逻辑上又站不住脚的事例所作的努力。此外，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还尽说些毫不相干的话来掩饰他的提案的破产，譬如他说什么这位委员长的代表都是“正派人”，好象有人说过这些先生们不正派似的。但是他们正派与否和他们声称的代表权的合法性又有什么相干呢？

131. 美国要求的双重代表权在道德上是不许可的，在法律上是站不住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132. 它是不许可的，因为这种解决办法是侵犯伟大中国的内政。宪章对中国席位的问题说得很清楚。这个席位属于中国，谁行使中国的控制权，谁就有权获得这个席位。

133. 主张蒋介石政权是联合国的一个创始会员国是肤浅之识，而且也是荒谬透顶的。因为那个创始会员国是中国。假使我们现在要以一个国家的政治面貌或以某个当权的政府来确定该国是否为这个组织的会员国，那么我要提出，显然，本组织的多数会员国老早就该撤销它们取得会员资格的权利了。因为过去二十年中，有多少个政府已发生了变化？

134. 允许两个代表来代表一个中国将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照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的说法，为一个国家打开这条路就是为许多国家开路。本大会的所有会员国，特别是中、小会员国，需要非常非常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有多少国家能忍受一个敌对的代表团声称在这个组织有代表权呢？关于白俄罗斯、乌克兰和苏联的多重代表权的这个论据，有意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苏联政府曾要求并同意这种代表方式。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要求和同意过双重代表权。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愿——我重复一遍，不愿——成为肢解自己国家的一方。

135. 我国政府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我们也承认台湾是中国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让我思考一下那些声称台湾前途未定的代表团所持的偏见。对他们，我们要这样说：我们在这里讨论中国代表权的问题。蒋介石的代表在十月十八日的发言中没有提到台湾。他自称并不代表台湾讲话，而是代表整个中国。因此，以所谓台湾前途来混淆中国代表权问题是美国有意玩弄的花招，它想进一步扼杀本组织多数人的愿望。因为这纯粹是内部事务，我们这里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中国人民的内政。

136. 本大会面临的问题是决定两个代表团中哪一个有权代表中国人民讲话。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决定投票的立场。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再次高兴地成为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二十三国决议草案〔A/L.630 和 Add.1 和 2〕的提案国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将投票反对象文件 A/L.633 和

Add.1 和 2 中的美国决议草案那样旨在阻止大会通过这个合理和必然的决定的任何决议草案、动议或修正案。本大会的威信，全要靠击败那个动议。

137. 显然，现实主义的概念对美国政府来说有一个不同的解释。对于美国来说，现实主义似乎是由程序问题上的花招组成的。这是人们对美国提议的所谓“重要问题决议草案”〔A/L.632 和 Add.1 和 2〕的唯一解释。这项动议也许在形式、风格、甚至实质上同美国人在历届大会上支持的类似动议有所不同。但是动机还是一样的。

138. 过去十年来，坦桑尼亚在关于程序问题的辩论上的立场一直是：中国代表权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中国已经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事实上还是一个创始会员国。甚至在那时我们就主张这个问题是中国代表的全权证书的问题。大会是不是该继续承认二十二年前就被中国人民推翻的政权的代表权？对于这些已被中国广大人民抛弃，在一个外国强国的保护和监护下居住在台北，而又拚死认为自己是“中国统治者”的人们所发表的荒谬声明，大会是不是予以宽恕呢？我们当时主张，正如我们现在主张一样，本组织只有不顾自己的威信和效能才能继续阻止中国的真正代表取得他们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令人高兴的是，大会的多数代表都纷纷反对蒋介石的荒谬言论，并责令他的代表把目前在中国名义下非法占据的席位归还给它合法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

139. 因此，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也不存在什么驱逐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在这里提过，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二十三个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 A/L.630 和 Add.1 和 2 一旦为大会通过，联合国的会员国总数就会从一百三十一减少到一百三十个。美国认为摆在大会面前的问题是涉及驱逐的问题，并且，引用布什先生的话来说，“就是那么简单”〔第一九六六次会议，第 80 段〕，这种讲法，显然是话不切题，而且无疑是存心要以歪曲事实来混淆问题。

140. 但是，本组织的会员国不会没注意到美国这种不合常规和违反宪章的做法，它想把“两个中国”的政策强加给我们的组织以增加这个组织会员国的数目。为此，投票赞成美国草案的结果就是增加这个组

织的会员国。如果甚至在改正中国代表权之后，仍有一百三十一个会员国，这倒确实是个离奇的驱逐事例了。美国应当先老老实实地把这个简单的算术弄清楚。

141. 在这次辩论过程中，我们听到慷慨激昂、然而不合逻辑的发言，要求正义、实用主义和现实。除非这些字眼都失去了原意，否则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决心再次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合法权利的美国应当对它自己提出这些要求。想要继续剥夺四分之一以上的人类在这个组织的合法地位的是美国人。想要擅自提出肤浅的、中国也不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的是美国。想牺牲原则的是美国。最后，想破坏我们组织宪章的还是美国。花言巧语无法掩盖这些事实。世界在注视着这个组织，看它是赶上时代还是依然屈服于一个大国的所谓国家利益和高傲感的命令。

142. 投票赞成文件 A/L.632 和 Add.1 和 2 中的美国决议草案就是投票赞成进一步阻挠。投票赞成那个动议就是赞成进一步玷污这个组织的形象。

143. 投票赞成文件 A/L.632 和 Add.1 和 2 中主张双重代表权的美国决议草案就是赞成非法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仍然相信抱有各种意见的大会会员国不会允许当前这种严重的反常现象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美国的种种花招，这不是为了赢得辩论的胜利，而是为了这个组织和全人类的利益。我们决不能让某些国家，不管它们多么强大，指望大会提供适合其自私动机的大合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算是一个联合国。也只有这样，本组织才能发展壮大，才能期望受到景仰和尊敬。

144. 最后，我们要借此机会向我们尊敬的非洲同僚发出一项特殊而庄严的呼吁，吁请它们采取公正而现实的立场。我们非洲人具有丰富的但惨痛的经验，深知对我们非洲有着重大和真正利害关系的问题如何无法——我重复一次，无法——得到美国的主动支持。

145. 图迈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联合国，在美国，事实上在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普遍认为，现在所谓关于中国的辩论或我们坚持称之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辩论值得

最密切的注意。要密切注意也有些困难，因为双方都有很多人积极地和戏剧化地参加辩论。现在，即将实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巨人，经过二十多年的阻挠，终于可能得到公正待遇了。去年在这个讲台上反对我们的人今年到讲台上来支持我们了，这绝不是没有意义的。

146. 另一个事实是，在第二十五届大会(第一九一三次会议)出现多数票之后，又有很多欧洲、亚洲和非洲国家改变了立场。此外从积极方面说来，我们注意到，反对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及其支持者过去诬蔑中国一心侵略、不爱和平，现在他们常用的那些形容词听不到了。但是，在立场上最引人注目的改变也许还是美国代表团本身，它已从反对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套老主张转变过来，从正面看来，它目前的立场是要求把蒋介石的代表排除出安全理事会。这种变化表现在美国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决议草案(A/L.633 和 Add.1 和 2)里，其执行部分第 1 段建议“它〔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取得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一”，这意味着必须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们在安理会中非法占据的席位排除出去。但是，对于美国这种欺人的改变，徒具外表的改变，我在后面的发言中还要谈到。

147. 对于联合国代表团，常驻代表团，以及那些来到大会但很少有机会在纽约或美国听到典型的政治竞选演说的人们来说，美国代表布什大使上星期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美国政治竞选演说的绝好例子，他使用了一切特有的华丽词藻，多种多样的最高级形容词，模糊了中国的现实，掩盖了问题，并弄昏了美国听众，特别是在他提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了为什么这些国家在这里有代表的历史背景。总之，这确实是一篇伟大的演说，讲得非常漂亮，但是空洞无物，言之无理。

148. 大会从本星期一(第一九六六次会议)开始辩论中国问题以来，已经听了不下四十五个发言。很自然，代表们的注意力可能已经无法集中，特别是在象这样长的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要跳出重复叙述任何一方意见的圈子确实很难。但是允许我声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无须重申。它

不是根据权术而定的，而是根据原则而定的，不是出于诡辩，而是出于真正关心宪章规定应当付诸实施；不是出于效忠于这个或那个大国，而是出于由衷地感到必须有一个以法律、正义和均势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149. 先我发言的几十位发言人不止一次地总结了关于中国的辩论的基本问题。因为记忆力——这是人之常情——只能回忆最近的事情，所以我要提一提昨天上午厄瓜多尔代表，以伟大的法律头脑闻名的贝尼特斯大使在其精彩的演说中对问题所作的总结。我完全赞同他下边的解释：

“如果把这个问题归纳成几个基本要点，那么它只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方面，包括决定两个当局中的哪一个应在本组织，包括安全理事会，有永久代表权。这两个当局都声称是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所提到的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另一个是法律方面，它牵涉到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领土主权的要求，两个政府都声称这些岛屿都是在中国的统治之下。”〔第一九六八次会议，第114段。〕

150. 我不企图也不愿意详细论述有关这两个根本问题的论据，但是它们倒确实引起了下面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直接对蒋介石的代表讲过话。主席先生，我想通过你提出下面几个问题。第一，你们是否象美国一样承认有两个中国？第二，你们有没有公开支持过“两个中国”的政策？第三，你们不是一直声称自己是整个中国的唯一代表吗？第四，你们自己的领袖蒋介石不是在这个或那个场合——不止一次地——宣称大陆中国是福摩萨的一部分，而且他还想解放它并光复整个中国大陆——从而表示只存在一个中国吗？

151. 即使在本星期的辩论中，这些代表也从来没有在他们的主要发言里，提出过两个中国的要求——美国代表团提出的要求。如果蒋介石的代表对这些问题继续保持沉默，那么就是承认，同我们所主张的一样，只有一个中国。但是是哪一个中国呢？

152. 我现在谈谈第二类问题，这是直接针对美国代表团的，不过它们也跟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有关。第一，设想一个国家发生了内战，成立了两个政府。根

据宪章第二条第七项，这难道不是一个纯粹内政问题，联合国——或美国，这个已成为世界警察的国家——无权干涉吗？第二，进一步假设，这两个政府是在第三者军事援助下一方脱离造成的。你们根据什么原则来决定承认一个而不承认另外一个呢？

153. 但是，如果这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事实上它不是——而是为了权宜之计和任意选择——事实上是这样——那么我们盼望听到的就是我们已经听过的美国代表在提出他的决议草案和论点时所说的话，他说：

“这样，中国所有的人民最终将由实际上统治他们二十几年的两个政府在联合国中代表着他们”〔第一九六六次会议，第66段〕。

但是这一立场正是使联合国二十年来在辩论中陷于僵局的同一立场，今天也不会使一国人民有两个政府的问题得到解决。

154. 关于这些问题，让我提醒诸位，美国的一位总统，杜鲁门总统，和一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他们两人都承认福摩萨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现在所谓的“中国问题辩论”在当时是美国政治上的首要问题之一。迪安·艾奇逊在他的《创世纪的见证人》一书中——我诚恳地建议所有反对我们的人读一读那本书关于中国的一章——说过下面一段话：

“今年年初”——一九四九年——“当我和总统”——杜鲁门总统——“谈到国会和新闻界对我们在我们政策上的批评时，我提到其中许多批评都是由于不明事实而引起的。马歇尔将军不愿意公布全部事实，唯恐进一步伤害这位委员长的日薄西山的命运。”提到的这位委员长就是蒋介石。“现在很清楚，大陆上的国民党政权正频于崩溃，下一步是美国必须停止对它的支持。我主张，我们准备一份关于我们和中国的关系的详细记录，集中谈过去的五年，并在崩溃到来的时候发表。总统同意了，于是……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便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交给了总统……我的信……”——即迪安·艾奇逊的信——“也分别发表了，题目是《中美关系：概要》。总统的一个

简短声明强调他‘目前这时候发出这一坦率而真实的记录，主要目的在于保证我们对中国和整个远东的政策，将要以有见识的和明智的舆论为基础。’二十年后”——迪安·艾奇逊在一九六九年写道——“关于中国的白皮书仍然有效地作为一份公正、正确和学术性的报告和事实分析。……

“这个概要的结论曾使那些相信美国万能的人垂头丧气，对这些人说来，每一个未达到的目标都只能以无能或背信来解释。”

引述《概要》时，迪安·艾奇逊接着又说：

“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范围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我强调这点——“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中国内部作出了一项决定……”。⑦

让我重复这句话：“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就是美国——“曾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中国内部作出了一项决定……”。

155. 迪安·艾奇逊接着说：

“一月五日，他向国会提出国情咨文之后的这天，他”——杜鲁门总统——“发布了一份四段的新闻稿，其中，他在宣布美国政府无条件地承认福摩萨为中国领土之后，继续说：

“‘美国对福摩萨或其他中国领土没有掠夺的企图。美国在目前这个时候不想得到特权或利益，也不想福摩萨建立军事基地。’”——我着重指出“在目前这个时候”——“‘它也没有使用武力干预当前形势的意图。美国政府不愿采取一个将使它卷入中国内战的政策。’”⑧

156. 此外，迪安·艾奇逊关于杜鲁门总统还说了以下一些话：

⑦迪安·艾奇逊：《创世纪的见证人》（纽约，W.W. 诺顿公司，一九六九年），第302-303页。

⑧同上，第351页。

“首先，总统已指出，我国政府认为福摩萨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在四年前占领了该地，按照公开作出的诺言，已经把它交还给中国政府，之后由它管理。不管他人可能提出什么政治上或法律上的诡辩，就美国政府来说，福摩萨是中国的。”⑩

迪安·艾奇逊接着说：

“我的叙述以解释总统这句‘在目前这个时候’作为结束”——因为时间在变化——“这是用在‘美国在目前这个时候不想得到特权或利益，也不想福摩萨建立军事基地’这句话里的：‘那几个字并没有在任何方面限定、修改或削弱总统在这个宣言里所说的基本政策。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在不大可能但又不幸的情况下，我们的军队如果在远东受到攻击，美国必须完全有自由在任何地区采取任何维护自己安全的必要行动。’”⑩

157. 我们一定要作出我们的结论。美国的政治家们——不大不小刚好是一个总统和一个国务卿——自己提出，只有一个中国，福摩萨是它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是一个整体，并且，根据杜鲁门总统自己的说法，“不管他人可能提出什么政治上或法律上的诡辩，就美国政府来说，福摩萨是中国的”，难道还有比这更清楚更明确的证据吗？

158. 在回头谈到发生内战和一方脱离的情况下应该承认哪个政府的问题时，不用我来提醒美国大使去想想他们自己国家南北战争的历史。他一定熟悉一八六一年三月四日林肯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但是对那些不熟悉这种情况的代表，我想引用下面几段话。林肯说：

“我认为，考虑到普遍规律和宪法，各州的联邦是永久的。在所有国家政府的基本法律中，这种永久性如果没有明显地表示出来，也是包含在里面的。……”

此外，在提到南北战争的原因时，他说：

“如果在这种情形下，少数人要脱离而不愿

⑩同上。

⑩同上，第352页。

妥协，他们会开创一个先例，这一先例又转而分裂他们并毁掉他们；因为每当多数一方拒绝接受少数一方控制时，他们自己中间的少数派就会脱离他们。……”^①

159. 提到一九〇〇年的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事件：中国义和团的反抗运动，我们记得美国派了美国军队同英、法、德、日军一起组成一支国际军队镇压这个反抗。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麦金莱总统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领导下负责在一九〇〇年七月三日给欧洲列强的照会中说明美国参战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当然，我们现在把这一切看作是一个讽刺。

160. 此外，联合国承认主权国家，但不干涉它们选择什么形式的政府。这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并且这是完全属于国内管辖范围的事。当政府内部发生变化，无论经过革命或议会程序，新政府总是采取行动，通知联合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所做的。当时他打电报给大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并要求联合国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精神，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以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②

联合国是否认为自己具有这样的权力或权限可以因为政府名称的改变而对这个新政府的权利表示怀疑呢？让我们看看这里大会会堂里的两个投票牌：最近有多少名称改变了？我前面一位发言者代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这个国家过去一直叫作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在是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还有很多别的例子。这是不是就给大会怀疑这些国家政府的合法性的权利呢？名称的改变会改变他们出席联合国的权利吗？

161. 我现在想指出美国两个决议草案中几处显著的矛盾——第一，关于决议草案 A/L.632 和 Add.1

和 2，它要求对我们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 [A/L.630 和 Add.1 和 2] 应用宪章第十八条。

162. 宪章第十八条提到会员国的除名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会员国的除名问题，在宪章第六条明确提到并作出规定，即大会将会员国除名须经安全理事会建议。但是安全理事会并没有开会建议把蒋介石的代表除名。许多代表曾清楚地说明，空出蒋介石代表的席位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合法的和合理的结果。

163. 现在，假定我要向美国代表提出其他一、二个按宪章第六条应予除名的国家，因为照该条的字句它们“屡次违犯本宪章所载之原则”。假定我指出一、二个国家，它们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七一年全然不顾大会、安全理事会、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不下一百二十项决议，因而践踏了宪章所载的原则。我们竟发现美国政府有一次在安全理事会否决了一个要求制裁这样一个国家的决议。我们发现美国政府竭尽全力，包括提供武器和数十亿美元给这些国家，特别是给其中某个国家，使它能够继续狂妄挑衅和破坏法律。在英文里，对这种作法有一个名称，即“双重标准”。

164. 文件 A/L.633 和 Add.1 和 2 所载美国决议草案“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并建议它得到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一”，这就意味着美国代表团——如果我们真懂得英文——在二十年后承认了宪章第二十三条所授予中国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决议草案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而不是中华民国，从而它终于接受了过去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劝它接受的意见。它所避不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是中国的唯一政府。而承认这一点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不可能有其他解决办法。然而美国代表团不承认这个事实，从而在同一决议草案中否定了它在执行部分前一段所承认的权利。

165.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听到过一个美国人先在美国参议院说然后又在联合国总部重复一遍的话。他威胁说，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入联合国，美国政府就不得不削减它给联合国的会费。我要向美国

^①H. S. 康马杰：《美国历史文件》（纽约，阿普尔顿 - 世纪 - 克罗夫茨公司，一九六三年）。

^②见文件 A/1123（油印本）。

代表布什大使道歉，他曾训斥并告诫我们不要使用粗鲁的语言。但是，尽管我在使用一种非本国语言时费力，可是我发现，这位美国参议员在这里重复的声明中，除了英语中叫做“政治讹诈”或者也许是“美元外交”的东西以外，别的什么内容也没有。但是，如果我能想到另外一个或几个词来形容这种声明的话，我就应当用上。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毫无疑问总有一天会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地位。

166. 现在，如果我们考虑到十年来美国能在总务委员会阻挠联合国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问题以及从一九六〇年能靠它的顽固立场阻挠该国进入本组织，同时，如果我们考虑到联合国为进行这些辩论作了预算花了钱，为解决这个问题消耗了时间和精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可在这段时期所交付的会费，那么要求联合国补偿这些损失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合法和实际的，如果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金钱的话。

167. 美国对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一事曾一再拖延不肯同意，因为它不喜欢该国的政府。但是，美国以前有一位国务卿，即史汀生先生，他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对外交关系委员会说：

“我们当然不能对其他国家否定我们本国政府据以建立的原则，即每个国家有权以它自己喜欢的形式治理本国内部，按自己的意志改变这些形式；而对外同其他国家处理事务时可以通过它所选择的任何机构，无论是国王、议会、议院、委员会、总统或任何组织形式。”

168. 最后一点。有重大意义的是，第三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于一九七〇年九月八日至十日在卢萨卡举行，出席的有联合国五十三个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会员国和十二个来自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观察员，会上通过了以下决议：

“国家或政府首脑宣布，为使联合国更有效能，各会员国必须承认并接受会员方面的普遍性原则。在这方面，他们强调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该组织合法地位的迫切需要。”^③

^③ 见《第三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的卢萨卡宣言……和决议》（卢萨卡，一九七〇年九月八日至十日），第19页。

169. 如果我们要消除持续二十一年之久的反对中国的行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只有拒绝美国的决议草案，并通过二十三国决议草案。

170. 我们在投票的时候，要为一项原则来投票。让我在结束时提醒我们的美国对手，他们的第六届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说过：“要永远投票赞成一项原则，即使只有你一个人投票赞成也罢，这样你就可以有个甜蜜的回忆，你投的票从没有白投。”

171. 绍尔考先生（匈牙利）：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立场一直是明确的，始终如一的，也是各会员国都很了解的。这一立场是不需要解释的；它完全符合宪章的精神和指导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正如我们在前几年辩论时多次明确说过的，我国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所有机构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代表权，包括拥有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席位之一的权利。作为这种考虑的必然结果，我国代表团强烈反对双重中国代表权，因此也反对决议草案 A/L.632 和 Add.1 和 2 以及决议草案 A/L.633 和 Add.1 和 2，这些都是有害的提案，因为它们想要阻止这个问题得到公平的最后解决。由于这点，匈牙利代表团将投票赞成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 A/L.630 和 Add.1 和 2。

172.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在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指出，过去二十二年，那些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代表八亿人民的大国被屏弃于这个世界组织之外的人已被证实是：

“……损害了本组织，损害了一般国际关系，损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是，也损害了它们自己”（第一九六四次会议，第 115 段）。

173. 因此可以理解，由于对实际情况逐渐了解，越来越多的会员国采取了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立场。正是由于这种了解的结果，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在二十五届大会（第一九一三次会议）得到了多数的赞成票。

174.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积极的发展促使那些想拒中华人民共和国于联合国之外的势力作出了新的

努力。他们的目的没有改变，但策略变了。这些策略是以陈旧的和错误的“两个中国”的观念为基础，含有企图把注意力从问题本质转移的骗人花招。当总务委员会第一九一次会议讨论通过本届议程时，那些诡计就十分露骨，十分明显了，那时美国代表想采用一种所谓较为中立的名称，无非是想维持现状并破坏问题的有效解决。当时本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个问题，即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的问题上是否曾在某种程度上持中立态度。

175. 美国代表在这次辩论中为支持美国倡议的双重中国代表权所提出的论点，同他们在关于程序问题的辩论中提出的论点同样没有根据。这就是为什么他所说的“投票赞成阿尔巴尼亚决议草案便是投票反对普遍性原则”〔第一九六六次会议，第75段〕这种观点是无法叫人接受的。

176. 联合国创立以来，一直阻挠普遍性的正是美国，这是历史事实。在过去二十二年，美国在配合那种作法时总是出来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现在它干的基本上依然是那一套，它向大会提出了诸如文件A/L.632和Add.1和2以及文件A/L.633和Add.1和2所载的决议草案。历史事实是，从这个世界组织建立以来，美国从来没有为普遍性讲过话。在这方面我可以提一提，许多国家想加入联合国这件事，过去和现在都是由于众所周知的诡计而被拖延了。

177. 企图引用生活于兄弟般联盟的几个苏维埃共和国的代表权来强迫接受双重中国代表权的观念，也是同样错误和不可接受的。在蒋介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联盟的关系。

178. 再也没有比这里的代表所熟悉的前任美国常驻代表查尔斯·约斯特的意见更能说明美国在这项辩论中担当的重大任务了。他在《展望》杂志九月—十月月号写道：

“从历史的前景来看，我们的子子孙孙毫无疑问地会对这件事感到惊讶：统治着福摩萨以外的全中国的政府赢得内战之后二十多年还不能得到联合国代表权。这种长期的排除作法说明，美国在这几十年付出了令人难忘的、虽然并不令人鼓

舞的精力，因为看来毫无疑问，要不是它的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年前在纽约就有代表了。”^④

他又说：

“就联合国方面来说，行政当局采取了骑墙的态度，想鱼与熊掌兼而有之，换句话说，想在这个‘两个中国’的旧观念中注入新的生命。”^⑤

179. 这一切证明，美国的立场完全是想再度阻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因此，这种立场是一切诚心寻求解决问题并相信我们组织的作用和前途的会员国所不能接受的。

180. 联合国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大会必须纠正这个存在了二十多年的不义行为并保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创始会员国的权利。它的决定将证明它自己的成熟程度。排除程序上或其他方面的种种诡计，使联合国摆脱某大国的自私政策的束缚，乃是全体会员国个别的或集体的责任。我国代表团相信，多数会员国意识到他们的责任，将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

181. 法克先生（荷兰）：荷兰代表团以很大的兴趣和注意力倾听了议程项目中关于中国的辩论。我国代表团知道，今后要作出许多重要的决定，为了避免对我们的意见引起任何误解，我想解释我国代表团对这个问题和当前的决议草案的立场，同时解释我们的投票打算和理由。

182. 首先，我想说明，这三个决议草案没有一个使荷兰代表团感到完全满意。对我们来说，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文本，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占有中国在我们组织的席位，同时要求秘书长或一小群有识之士按照普遍性和自决的原则研究余下的问题，然后把他们的调查结果向大会报告以供进一步审议。

183. 但是，我国代表团很清楚，这种作法目前不会得到大会足够的支持，我们因此打消了提出一项决议草案供大会审议的念头。战线似乎已经拉开了，大会的气氛看来不象是能冷静地思考和研究政治与历

^④ 查尔斯·W. 约斯特：“中国、美国和联合国”，《展望》，第七卷，第2号（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月），第14页。

^⑤ 同上，第17页。

史事实及其影响。相反，显然几乎所有会员都想尽快对我们面前的几个提案进行表决。

184. 经过仔细考虑以后，荷兰代表团立场所依据的主要因素究竟是什么呢？很清楚，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是，荷兰早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法律上的政府，同时撤销了我们对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承认。九月二十一日，女王陛下在最近一次对议会作的皇家演说中宣称：“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讨论对缓和世界政治紧张局势是不可缺少的”。十月一日，荷兰外交大臣在本会堂的发言也反映了这些话〔第一九四八次会议〕。荷兰政府的目标是清楚的：它希望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尽早在联合国和联合国大家庭的一切有关机构取得中国的席位。十月十四日，荷兰首相在海牙的国会把这项目标描述为目前情况下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因素。

185. 也许有人要问，还留下些什么难题使我们伤脑筋呢？我国代表团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也是这个大会所面临的问题，看起来是双重的。第一，我们看到一块领土，一个相当大的岛屿，居住着一千四百万人民，在一个声称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政府的实际治理之下。荷兰政府认为，这种事实上的政治实体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虽然我们在这方面既没有同它保持关系也不承认它公开宣布的要求。第二，荷兰政府非常重视联合国这一世界性组织的普遍性原则。在这方面，我们决不是孤立的，这从这届会议一般性辩论中可以看出。因此，提出将来能否找到一个满足台湾人民特殊要求的解决办法这个问题，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在决议草案 A/L.630 和 Add.1 和 2 中，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提供最后答案。

186. 不管大会和个别会员国如何看待这两个问题——一个政治实体的实际存在和联合国的普遍性——荷兰政府坚决认为，大会决定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之后，使用暴力手段以改变有关台湾岛的现状，是不应当受到鼓励的。我相信，本大会会员国即使不是全体，至少绝大多数是赞同这种看法的。

187. 荷兰政府不知道台湾人民的前途如何，但是就荷兰政府而言，它可以预见到未来的各种可能发展。

188. 最后，荷兰代表团希望提出以下几点。

189. 荷兰王国在许多年前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还和北京保持着外交关系。我国政府认为，北京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国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即取得它在联合国的席位是符合国际社会、联合国和中国本身的利益的。

190. 既然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所以荷兰代表团不能赞同任何提及中国某个其他政府的提案。

191. 虽然荷兰非常疑虑把任何代表团从这些会堂驱逐出去，但只要对这个事件的政治和历史因素以及这样除名给有关各方的影响和冲击还未进行彻底调查，荷兰代表团就仍然投票赞成阿尔巴尼亚和其他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A/L.630 和 Add.1 和 2〕。我国代表团将要投赞成票，首先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决议草案是保证把中国的席位分配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种手段，这是我国政府全心全意支持的目标。第二，我们觉得，决议草案最后一句话，从“并且要开除”起，意在表达只有一个中国政府，而自称代表中国的其他人无权——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占有中国在大会的席位。

192. 按照我前面的发言，荷兰代表团当然不能赞同决议草案 A/L.632 和 Add.1 和 2 以及 A/L.633 和 Add.1 和 2。在仔细考虑了前一个决议草案的含义，特别是它内在的法律上的矛盾以及它可能造成的拖延后果之后，我必须宣布荷兰代表团在对此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将弃权。

193. 我们希望后一个决议草案不会付诸表决，但是如果它要付诸表决，我们也打算弃权，其理由我刚才已经说明了。我们强烈地感觉到，为了公平对待起见，大会应当向有关各方保证给予公开辩论的一切机会，而不应当阻挠我们的代表同事们为提出决议草案所作的努力。

194. 因此，荷兰代表团将投票赞成优先表决澳大利亚和其他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 A/L.632 和 Add.1 和 2 这一程序性决议草案。

195. 一九五〇年，荷兰代表团在大会投票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取得中国的席位。今年我国代表团希望看到这个目标得到实现。

下午六时五十分散会。